

青年学术丛书·历史

YOUTH ACADEMIC SERIES-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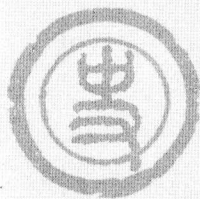
新时期中国社会 人道主义思潮研究

刁世存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青年学术丛书·历史

YOUTH ACADEMIC SERIES-HISTORY



新时期中国社会 人道主义思潮研究

刁世存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研究 / 刁世存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0736-3

I. ①新… II. ①刁… III. ①人道主义—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163 号

新时期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研究

XINSHIQI ZHONGGUO SHEHUI RENDAO ZHUYI SICHAO YANJIU

刁世存 著

责任编辑: 刘智宏 王一萌

特约编辑: 王一禾

封面设计: 肖 辉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65289539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3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0736-3

定 价: 29.8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刁世存十几年前随我读研究生时很爱思考，发文章多理论色彩。这或许是他决意研究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原因。他的硕士论文受到好评，随后做了几年高校教师，又攻博，论文答辩后再数年打磨，故此书凝聚了他十余载心血。

人道主义是大问题，涉及历史传统和价值选择。

我们的古人敬天，拜许多神灵，但没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格位上帝意识，也没有古希腊哲人对宇宙深入拷问的兴趣，而是关注人。儒家关注人们之间的关系，仁义礼智信讲怎样对待人；道家发现“反者道之动”的自然之理，进而有“莫大于秋毫而泰山为小”的齐物论，主张守弱逍遥，给人在世离世的超越智慧；佛理在中国转化为禅，予人入世出世的解脱法门，基本上都是“人道主义”，不是神道主义，也不是兽道或物道主义，但认为人因修炼可为神为圣为佛，有神道主义色彩。迨宋明理学，朱熹王阳明们以佛道思辨建构统天人合内外的新儒学，有了天理人欲之说，天理成为杀人之具。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重关系的复杂性而言，非民主的社会靠君主权力维系，儒家的社会学归结为君臣父子的政治社会学，老子学说转成南面之术，孔孟的人格和道家的守弱超越同禅宗的体悟色空一道，或扭曲于官场士林，或隐遁于山野篱下。因为天高皇帝远，普通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帝力于我何”的自由逍遥，但家族权力、忠孝伦理、饥饉寇盗和鬼神恐惧，使这自由多悲情色彩。因此，进入现代文明之前，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人，却无“人道主义”的理性自觉，或也无人道主义的价值体验。正因为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呼唤是有道理的。

在古希腊，或许由于荷马留下的泛神童话未能慑服人心，从泰勒斯就叩问宇宙本身是什么。智者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认为探讨物理和形而上学毫无用处，提倡人文知识、思维和德行。柏拉图说人是万物和一切真理的尺度，因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普遍原理、

观念、概念和理念，但个别人的看法不代表普遍，理念先于人存在，不了解宇宙的性质，就不能解决知识问题。他们观念中不同程度有神，也不同程度地关注人。

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以天启信仰为核心，说人的认识来自上帝启示，听上帝的话才能得生，是神道主义。又说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高过其他被造物，但人若违背上帝，按自己的价值判断善恶，行完全的“人道主义”，就会陷入撒旦的魔爪而死亡。上帝爱人，耶稣救人，也要人爱上帝，并且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在本体意义上，人无法逃出上帝的规则；在世界上，人却可以在遵循上帝规则的前提下得到自由平等平安喜乐，这是与神道相通的人道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它有两个特征：一是从对神的关注转向强调人和人性，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伟大，人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智慧、知识和力量，可以通过努力揭示宇宙的秘密，为自身谋福利；二是提倡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但丁说人是高贵的，因有天赋理性和自由意志，区别于禽兽，人类的本分在求神圣的幸福，人性是爱。彼特拉克表示既爱肉体也爱灵魂，凡人只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主张人应当全面发展，天生平等。瓦拉主张意志自由，反对禁欲，认为个人的生命比宇宙国家都重要。爱拉斯谟歌颂人性解放、寻欢作乐，认为人顺应自然本性生活才是幸福。后来的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这样，文艺复兴开启的近代哲学洋溢着人类理性的特征，但其经验主义和重视自然科学，于推动机器文明的同时，造成物欲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丧失或削弱了人对自身的关怀。其唯理主义在鼓舞人类自身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推动知识进步的同时，也造成压抑个性的偏颇。马克思主义对前者进行了反思，非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则对后者进行了反思。

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性论，拒绝了神道，同时从历史和人类实践的本质出发，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异化，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自由本性的回归。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若干国家实践，既取得辉煌成功，也遭受重大挫折。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生产力大都没有发展到高级阶段，前现代观念依旧浓厚。

我国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凸显了这一历史积淀的负面影响，不仅将中国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文化积累的人道主义因素荡涤净尽，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之光屏蔽。改革开放后，人道主义思潮兴起，从反思

“文化大革命”中的非人道现象，到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和东西方历史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追问人的存在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刁世存这部著作从概念、渊源、过程、内涵、价值多层面分析这一思潮，资料翔实，立论严谨，论述平实，文字洗练，虽然有的地方尚须深入，有些看法或为一偏之得，但对了解和理解三十余年来国人思想解放和心灵开放的一个侧面，显然是有帮助的。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带来丰富多彩的文明享受，也引发价值多元信仰危机，同时为审视既往，重建现实与未来的理性生活准则提供了机遇。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是在借鉴东西方文明，继承优秀的古代文化和近代革命传统基础上的理念创新，引导我们立足现实国情和发展需要，充分研究世界文明中人道主义成果，更好地理解人道主义与合理人生的关系，为解决我国和全世界人类面临的现实环境和生存问题作出贡献。望读者从本书得到这方面的兴趣，也望作者今后的研究有更多创获。

朱志敏

2010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一、选题意义	/ 1
二、研究状况及成果评析	/ 6
三、研究原则、方法和内容	/ 12
四、重点与创新	/ 13
第一章 新时期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的历史因缘	15
一、人道主义在西方的历史演进及其作用	/ 15
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艰难跋涉及其命运	/ 20
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34
第二章 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	50
一、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	/ 50
二、人道主义思潮的社会心理渊源	/ 57
三、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	/ 63
第三章 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演变	68
一、初澜：“伤痕文学”的崛起和“人道主义热”	/ 68
二、高潮：围绕周扬讲话展开的争论与胡乔木文章的发表	/ 79

三、沉寂：“一边倒”形势下的反思	/ 85
四、变奏：“一个共识”与“两大走向”	/ 92
第四章 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	100
一、从“阶级的文学”到“人的文学”	/ 100
二、现实的哲学反思与人	/ 108
三、人道主义思潮在学术界的表现	/ 118
第五章 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特点	128
一、与其他运动相比,自发性与广泛性	/ 129
二、从思想来源看,历史感与现实性	/ 133
三、从学术角度观察,从情绪化到理性化	/ 139
四、从指导思想考虑,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与再认识	/ 146
第六章 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151
一、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	/ 151
二、人道主义思潮中的学术演进脉络	/ 159
三、人道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 166
第七章 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化	174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意识	/ 175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	/ 182
三、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	/ 188
结 语	197
主要参考文献	199
后 记	205

导 论

一、选题意义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从此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所谓“新时期”,是指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化体制的转型期。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古德曼提出,与新时期的到来相适应的是,中国放弃了此前持续二十多年的准战争体制,开始了另一个阶段,即“改革与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就是这一阶段的新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①此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与此密切相关。

新时期开始以来,特别是“苏醒的80年代”,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可以和五四时代相提并论的两个最为主要的思想启蒙与全面革新的时代之一。^②历史转折,思想解放,观念更迭,价值震荡。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各种社会思潮跌宕起伏,此消彼长。三十多年社会思潮变化之快前所未有,令人惊叹,许多东西甚至还没有固定成型,就已变得陈旧了。多种思潮花样百出,激荡并存,与思想流派、哲学观念、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居民心态、社会情绪一起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绚烂多彩,令人迷

^① [澳] 大卫·古德曼:《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参见沈明明主编:《改革发展与社会变迁》,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174页。文中指出:“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明显与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的中国不同,尤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已经塑造了一个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为自由的中国。”

^② 张宝明:《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83~88页。作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世纪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

惑。在“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内外思潮的激荡中，新旧知识界日渐泾渭分明，裂痕凸显以至无法弥合。

从最直观的现象来看社会思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分为有明显区别的两个大的阶段，大致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此，高瑞泉先生提出，从社会思潮研究的角度说，“新时期”主要是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的以“思想解放”为旗帜的十年；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有人称作“后新时期”。前后两大阶段的社会思潮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前者是20世纪80年代思潮的主流，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思潮的底色。^① 在新时期开始以来出现的众多社会思潮之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性复归、人道主义，以及从各个方面发出的人的呐喊，成为新时期开始的年代最强音。人道主义思潮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声势之烈、影响之深，“真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展示出新时期的特点”^②，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史上特殊的思想文化现象，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潮进行研究和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多数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为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和从封建制度及宗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思潮，不论是对近代的历史发展，还是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学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人道主义问题复杂纷纭，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理论上对它作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尽管可以从不同方面和角度，用不同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但事实上，由于人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各异，始终难以求得普遍认同的定义。仅“试图定义‘人道主义’一词，可能会把人引向历史、文化和语言等许多种途径上去”^③。这种状况在中国变得尤为特殊和复杂。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

① 高瑞泉：《激情与土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背景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页。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③ [美] 大卫·戈伊科奇、约翰·卢克、蒂姆·马迪根：《人道主义问题》，杜丽燕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对于“人道主义”一词，没有人能够作出使别人也满意的定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对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在素有权威之称的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里，它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美、英、法、德、苏联、东欧等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关于“人道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具体内容参见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性和人道主义》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尽管如此，多数学者并不否认人道主义的共同原则，即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主旨的观念或思潮。

人道主义由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至一度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主要是把人道主义作为修正主义思潮拱手送给资产阶级，进行简单化、激进化、政治化的批判，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80年代中后期曾有一段时间，把人道主义作为“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置于清除、反对之列，认为它与“四项基本原则”格格不入^①。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理论上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光辉，反而在实践中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时还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制造了借口。

从国际外交态势来看，人道主义及人权问题，仍然是今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向我发难的一个重点视阈。其中包括西方大国对我们的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及其发展史研究上的一些含糊之处（如东方从无人权意识，如引证经典马克思主义而一般地反对人道主义和人权，等等）很不理解，甚至误解和深加苛责。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那种共产党人“不要人道主义”的论调，不管“来自什么营垒或者哪个方面，都是非愚即妄的无稽之谈”^②。孙月才在《人道与异化的对立》中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思想家看不到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应有的理论价值，是由于受到本阶级的局限，那么，极左论调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诋毁，实质上是借着‘劳动人民’、‘红色政权’之美名，为封建专制、宗教神学招魂而已，倒退了整个一个历史时代。”^③由于多年来我们不能全面认识历史上人道主义的含义和作用，没有阐明西方人道主义到底有哪些合理因素可以继承和发扬，有哪些错误的东西需要批判和清除，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

时代在发展，观念在解放，在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之后，中国政治和思想界终于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是，遮盖在人道主义上面的灰尘毕竟太深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出已经二十多年了，许多人似乎仍然有些忌讳这个概念，使人觉得它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地位是如此脆弱，以致大多数人都尽量绕开它走，它几乎成了尽管正确却无人理会的概念，更谈不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些年世风大变，“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人们不再讳言对金钱的追逐和爱好，人道与非人道的根本区别再次被许多人遗忘。于是，出现了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的小人；欺诈勒索、坑蒙拐骗、贪

① 华原：《痛史明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薄一波：《薄一波论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人民日报》1989年4月13日。

③ 孙月才：《人道与异化的对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113页。

污盗窃、腐化堕落滋生蔓延；侵犯人权、侮辱人格、抹杀他人价值甚至自我贬低的不人道甚至惨无人道（如拐卖妇女儿童）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有些人那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友谊被尔虞我诈、互相利用所代替，为了金钱和地位，置人格、国格于不顾。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不禁忧心忡忡：让这种不人道的思想和行为任意发展下去，社会主义不是面目全非了吗？天下岂不要大乱吗？据有关调查显示，35%的人认为中国人道主义的基础仍很薄弱，47%的人认为当今人道主义的环境只是一般。^① 这种局面，显然不能适应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特别重视和强调的，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与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现代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化体制”的转型能否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关键和核心。今天强调人的现代化，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从宏观的历史进程来看，提出人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在致力于完成以人的解放为主要特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业。在20世纪末我们高扬起社会主义人的现代化的大旗，意味着中国“新文化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第二，从中观的中国社会文明进步趋向来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建设的深层次目标。人的现代化同时意味着现代人个性世界的开放化和合理化，它和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对人的个性的长期压抑所形成的冲突已是历史的必然；就现代化变迁对现代人的行为和状态的的决定性影响而言，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社会变革的挑战向人的现代化研究首先提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扬弃；对于现代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取舍。第三，从微观的社会变迁的矛盾演变来看，人的现代化意味着人的素质、思想境界及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剧变、动荡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

研究社会思潮，既是历史经验的启迪，又有现实理论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产生的过程，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引导社会思潮的过程。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引导，正是党在理论上和党的整个事业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前提和基础。在新世纪开局的时候，我们还面临着许多理论问题，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和文化领域的等。这些理论问题，都可

^① 《敬礼！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一次问卷调查活动的感悟》，《中国残疾人》2004年第12期，第6~9页。

以通过对社会思潮的观察分析获得线索,提高对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水平,增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研究和探讨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潮,是当前进行党的理论建设,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要求理论工作者要下工夫研究人权、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问题,这不仅是为了澄清误解,纠正偏激,以适应国内外新形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已有成果还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人道主义和人权是适应和保护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具有克服“异化”现象,促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功能。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错误或过时的认识。因此,我们应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完善出发,从保障人权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出发,基于私产保护和“人权条款”入宪的新态势,把中外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史列为重点项目,进一步深入强化研究,为中国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事业奠定理性根基。

人类不同的种族之间是有文化差异的,但是涉及人类深层的东西,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识。人道主义是人类优秀的传统思想,也是人类伟大的理想。“人道主义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期间结出硕果,并随着现代科学和现代世俗民主制度的出现而继续繁盛。”^①古往今来,社会更迭不断,人道主义思想却一直在继承和发展。至今它已成为内涵丰富、含义深刻、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理论。尽管在这一领域学派林立、众说纷纭,但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需要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的规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中的新文化需要人道主义的魂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与人道主义是不可分离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②,立刻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一个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长期执政的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政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写入全

① [美] 保罗·库尔兹:《21世纪的人道主义》,肖峰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关于人道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参见[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会文件，用以人为本的思想作指导，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随着时间推移，将会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来。它像冲出地平线的太阳开启新的一天那样，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此精神的启发和指引下，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和研究，必然会并已经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回到学术争鸣的轨道上来。

二、研究状况及成果评析

对人道主义进行科学的研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人道主义研究萌发于1978年，至今已经历三十多个年头。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先后掀起四次研究人道主义的热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文革”及其以前数十年间人道主义问题在中国曾是深门重锁的理论“禁区”之一，“文革”以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否定必然导致人们对人道主义问题进行反思；二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现实实践迫切需要研究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三是西方关于人道主义的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四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中国对人道主义的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这一阶段，主要讨论了人性、异化、人道主义、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核心是人道主义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历史观，还是作为一种伦理观、道德观的问题。讨论的最大成果是在认识上意识到要把人当人看，应对“人”这一曾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加以研究，恢复和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在实践上既促使人们解放思想，敢于正视人的问题，又告诫人们，社会主义建设应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恢复和确立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讨论的不足之处是思想不够解放，疑虑严重存在，甚至带着情绪讨论，抽象分析问题。1984年1月，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讲话为这一阶段的争论画上了句号。^①

^① 参见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讲话的内容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实际上，前两个问题并不是争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之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的争鸣便终止了，尽管枝节问题的细小的不同意见还时有发生。

第二次热潮的兴起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这一阶段的研究依然围绕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在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而且日益深入，取得了重大进展。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人道主义及人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质、能力水平、精神状态、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全面发展等。核心是文化变革与人的现代化。最大成果是在认识上意识到必须把人当主体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在实践上既在于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效发挥主体的积极作用，又应把人格塑造当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讨论中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深入细致和辩证的分析，受 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笼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宣扬西方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人的设计缺乏理论基础，过于注重就事论事，缺乏严密性和全面性，出现了一些过激甚至错误的观点，如提倡抽象的人，主张个人的自我价值是人的价值的本质，在政治上主张三权分立等。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 1989 年，才告一段落。^①

第三次热潮的兴起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是人权问题，二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如何正确发挥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问题。人权问题的起因是 1989 年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平息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借此攻击中国不讲人权，并以此为借口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因而中国就人权问题作了专门研究，不仅发表了官方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②，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和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区别，而且在民间兴起了研究人权问题的热潮，出版了一批学术论著。尽管这场争论目前还在继续，还没有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由于人权与人道主义密不可分，或者说人权本来就是人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

①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于 1986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其中提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混乱情况，也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也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从中国历史和国情出发，以历史对比为主线，摆事实、讲道理，围绕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的观点展开，向世界系统阐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阐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促进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问题的关注，必然推动对人的主体性及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与人权问题相联系，在人道主义的讨论和研究中，存在着对人及其主体性较多逻辑抽象、片面夸大的问题，思想干扰依然存在，认识上的疑虑并没有真正消除。特别是专家学者和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干部对人及其主体性问题的理解有较大差异，难以达成共识。

第四次热潮的兴起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方兴未艾。从 1992 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两大基本走向。有些专家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致力于人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为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作准备，因而人道主义研究的热潮再度兴起；有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实性专题研究，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人的问题现实地联系起来。这两大走向的凸显，既是对 80 年代人道主义讨论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它以更为宽广的路径和更富理性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综观近年来的人道主义研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多停留在哲学层面上，而没有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生理学、文化学、价值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由于虽已减弱但仍存在的思想认识不统一，主体素质不适应，分析研究无力度，在人道主义、人的能力、个人及个性等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未被系统地总结和吸收，决定了这种研究反映不出“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对象的特征，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作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策应，对西方列强“人权外交”的反击，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党和国家在人道主义、人权问题上不仅是极力提倡的，而且把它们载入党的报告和国家宪法中。这自然就成为人们对人道主义问题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强大动力。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重视对人的研究，它们所取得的成果将人的研究推向深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人的个性、人的激励等方面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有的分析研究已接近真理的边缘，但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在研究方法上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当权者的政治谋略。西方发达国家的人道主义研究，在哲学和伦理学等学科中，向来表现为完全离开经济基础分析的纯粹思辨，它反映了发达的私有市场经济之下苦闷个体的反思及呼唤。它们研究人的本质，把注意力集中在抽象的本质，不理解甚至反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们研究人的价值，把自我价值、利己主义作为价值的核心；它们提倡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普遍原则；它们研究人权、提倡人权，是在人权的幌子下搞种族歧视，干涉别国内政。尽管它们

的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是对我们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它们确实提出和解决了人道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新问题，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私有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所面临的困惑，许多议论值得参考。^① 西方发达国家中还有一些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者，在人道主义研究中的地位不可忽视。^② 创建于1952年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伦理学会，广泛涉及了人道主义研究的一系列前沿问题，有助于我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了解和研究人道主义。因此，我们在进行人道主义的考察和研究时，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要注意鉴别，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或曰创造性转换或改造^③，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潮、确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论体系、繁荣中国的学术研究服务。

在新时期开始以来三十余年的人道主义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作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发表了一批学术论著，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目前，在中国理论界，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建设、人学理论、现代化进程或思想发展史的角度，重新反思人道主义问题的论者不少，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胡义成力主唯物史观方法，从市场经济说明人道主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呼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避讳人道主义的悖论性质及其他局限，批评人道主义研究中的“苏联模式”^④ 和“姚文元道路”^⑤，不仅使自己与“左”的旧路划开了界限，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笼统否定一切市场经济的思路拉开

① 徐侠：《国外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述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30～133页。

② 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是从马克思反对异化和“商品——货币拜物教”的否定市场经济的传统思路出发，以“异化”为核心范畴讲说人道主义，这种讲说，具体针对的是西方市场经济，有某些合理性。但是，它笼统反对一切市场经济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

③ 丁守和：《中国近代思潮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作者是在《中国近代思潮的思考》一文中，在谈到“研究近代思潮的重要性”时说这番话的，对研究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④ 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研究者，一般都沿袭18世纪启蒙学者从人性说明人道主义的“天赋”模式，从人性或人的本质论证人道主义。如果说，他们与启蒙学者尚有区别的话，那么，区别仅在于苏联学者们孤立地征引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来论证人道主义。当年苏联哲学界的头面人物费多谢夫以及在他之前的米丁，是典型代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迷失，也起因于苏联哲学界的理论粗陋。

⑤ 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反修斗争”中，人道主义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极左论者，在理论界和文艺界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正是依靠批判人道主义（包括批判作为平等权利的民民法权，即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而爬上高位的，“姚文元道路”和“姚文元情结”，是值得反思的中国文化现象。